

优秀奖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

作者：陶业

一、何谓解构极权主义？

现存中国之制度

中国现存制度不是一个传统的专制帝国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个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主义制度。

彻底解构极权主义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这一行动具有主动意义和积极意义。

解构极权主义的一切：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解构极权主义政治，解构极权主义经济，解构极权主义文化，解构极权主义社会，解构极权主义伦理，解构极权主义审美，等等。解构一切属于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总之，反对极权主义，必须从解构极权主义入手；深入地全面地解构它，直至它彻底垮台。

解构行动的特点，并不是全民动员去实施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而是在各个特定领域分别动员，以实施所在特定领域和行业的解构方案。解构就是拆卸和拆解极权主义的零部件，促使它解体。

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

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必然是由政治反对派组成的精英队伍。这是解构极权主义的特种部队，由一大批有思想、有智慧、有毅力、有创造力的人组成，他们是解构行动方案的制定人。他们最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比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即便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至少也是精通业务、懂得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如何去解构极权主义的内行人，因此他们了解哪里是解构的最佳突破点，哪里最适合首先拆卸；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是智者，更是勇士；他们知道如何将行动风险降到最低，如何保护民众；他们有牺牲精神，有担当人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他们挺身而出，挡在极权势力与民众之间；他们具有侠肝义胆，敢于奉献。由于对手是凶残的，因此即便是非暴力行动，依然存在牺牲的危险；为了避免民众付出牺牲，他们是首先承担危险的人。

这支精英队伍其人才从哪里来？从组织中来。只有组织中的人才，才能被凝聚，才能专注于行动。即便该组织后来离散了，失去了生命力，但个人会依然忠实于早年的奋斗目标。

比如民联，它是中国民主运动之同盟会，它贡献了孙中山先生一般的人物——王炳璋，我们不同意王炳璋先生所计划使用的手段，但我们敬仰他艰苦卓绝的创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行动能力。民联还贡献了胡适一般的人物——胡平先生，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他关注着民主运动的每一步发展，警醒着民运的每一步挫折、弯路与起伏；他呕心沥血，如“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般坚韧。

比如全美学自联，如同黄埔军校，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360名正式代表和600多名与会者，代表着全美各大院校八万硕博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它向海外民运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物，如杨建

利、韩连潮、余茂春、黄慈萍、任松林、刘永川、杨大力、殷鼎、时和平、贺保平、赖安智、陆文禾、陈兴宇、陈师众，等等，一个个都是叱咤风云般的人物，90%以上是博士。当全美学自联遭到中共破坏之后，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魏京生先生主持的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团结着全球民主力量；王军涛先生主持的中国民主党，在艰难中成长为海外街头抗争活动的主力。这都表明了行动需要组织，有组织才有人才。因此建议立即筹备成立“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以统筹各路解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又可分设下属工作委员会：方案制定委员会与方案执行委员会。

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

解构极权中国，人人有责。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当然是全体中国人。但凡不堪忍受极权主义压迫的人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参与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解构方案中，只需要默默地实行，就像在大街上散步，悠闲地，带着微笑地；就像在下棋，在心里琢磨着下一步棋如何走，但不露声色；就像在给孩子唱催眠曲，安静地，安然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就像春蚕吐丝，持续地奉献着微薄的努力。作为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那是亿万之众，大家都挺直脊梁，对极权主义说不，大家都将尊严不仅仅藏在心里也刻在脸上，让极权主义知道你不接受羞辱，你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大家都高昂自己的人格，蔑视极权主义权力的卑劣和猥琐。但是面临恶劣的环境时，能敷衍时则敷衍，不得不妥协时则要妥协，保护自己且又不伤害他人时可以保持沉默，作长期行动的打算。

如何唤醒亿万人一起行动？考验着政治反对派的智慧，但基本原则是作韧性抗争，避免直接对抗，不需要民众付出牺牲，不需要民众为此坐牢。

解构极权主义之手段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原则是甘地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作为原则，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守；作为手段和形式，则可根据现实予以必要的提升。不要误解，一说提升就意味着暴力，提升可以也应该是非暴力，取决于抗争者的智慧。

迈克尔·纳伯格在他的《非暴力手册》中有一段描述：“从情感上说，我们既没有因为害怕而逃跑，也没有因为愤怒而攻击，我们因爱而抵抗。从意图上说，我们既没有寻求胜利，也没有害怕失败，我们的目标是成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要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一同成长。”这里“一同成长”的意思，就是期待对手会被感化，因而放弃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不合作不是压制理性，而是把理性从麻木中解放出来，让理性统治偏见、仇恨和其他低级的激情”，非暴力不合作原则“不是对理性进行奴役，而是使理性获得自由”。甘地寄希望于双方理性的成长，以理性战胜其他。

马丁·路德·金说：不断努力说服对手“你是错的”。这个意思是说，指望对手终究会被说服。

既然非暴力首先张扬的是理性，那么就让我们来理性地回顾一下历史：

最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它使印度最终在二战之后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独立有三方面的因素：1.内因：它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年坚持的结果；2.外因：它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部分；3.它的对手是殖民帝国英国。这个帝国虽然对外殖民扩张，但对内却实行宪政民主。甘地曾经期望人民以非暴力抗争启迪殖民者的“善性”，虽然经历了几度暴力镇压，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迫使英国殖民者理性地撤出。

最具借鉴意义的非暴力抗争是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造船工人实行的总罢工，它催生了团结工会，一个可以合法活动的独立工会。其领导人莱赫·瓦文萨还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样归结为三方面因素：1.内因，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所展示的力量，受到天主教的鼓励，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将近有一千万工人加入，并在全国性选举中获胜；2.外因，美国的资金支持与梵蒂冈的道义支持；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3.对手，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所领导的波兰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政府，对团结工会的镇压使其失去了民众支持，最终失去了政权。

再看美国的例子，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公民抗争运动，为非裔美国人成功争取了基本人权，实现了种族平等的理想。1.马丁·路德·金长期致力于基督教神职工作，有着关心整个人类的情怀；2.深受列夫·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受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甘地的成功鼓舞了马丁·路德·金；3.马丁·路德·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一个在平权运动中成长的美国政府。

以上三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1.非暴力是一个长期坚守的思想运动；2.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道义支持；3.对手都是威权国家，或民主国家，即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面临的共产主义政权，更多像是一个威权国家，而不是极权国家。威权国家多多少少还依赖民心的支持，但极权国家即便民心丧尽也不会倒台，它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

符合理性的分析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更适合于对付威权国家，但是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是否适合对付极权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启示。由于对手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沉溺于历史的经验，在我们继承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对付威权专制的抗争模式并用以对付极权专制的同时，我们需要创建性地给出自己对付极权

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寄希望于对手还有一点人性，寄希望于对手的道德升华，寄希望于对手的最终让步和改变。甘地曾寄希望以非暴力抗争启迪英国殖民者的“善性”，他做到了；马丁·路德·金曾寄希望于美国政府能尊重基本的人性，尤其是能尊重非裔美国人的基本人权，他做到了；瓦文萨曾寄希望于波兰政府能有基本的觉悟，即尊重工人的选举结果，他做到了。但是，极权中国不具备这些特点，中国政府不具备基本的善性，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觉悟，不具备基本的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因此你感化不了极权中国的政府，它不可能对人民作出任何让步。相反，对于和平抗争，它一定会给予残酷的镇压，并且镇压没有止境：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

有人把共产党放弃清零归结为白纸运动施加压力的结果，不否认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在如此小规模抗议下就能改邪归正，那也过于乐观了。共产党放弃清零乃是因为清零已经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故就此而下了台阶而已。白纸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并无贬低之意，但她需要时间成长。

消极非暴力抗争与积极非暴力抗争

消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消极，因为它属于等待型抗议，等待对手被感化，等待对手改变策略，等待对手放下屠刀，等待对手最终觉悟。前提是对手有可能被感化，对手有可能发生内讧，对手有可能发生转型。

积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积极，因为它是主动但和平地出击；不寄希望于对手能被感化、被觉悟，更不寄希望于对手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对手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积极抗争在于主动地改变对手的机体，和平地解构它、拆卸它、肢解它。

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游行，静坐，绝食，罢工，举旗抗议，它并不触及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改变，这样的抗争模式属于消极抗争；而解构是主动的积极的抗争，它以解构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为己任，和平地解构它的神经，解构它的大脑，解构它的心脏和血液、肌肉和骨骼。

从消极状态进入积极状态，从被动状态进入主动状态。或者消极状态与积极状态根据需要相互切换，但始终坚持着和平和非暴力抗争模式。

解构极权主义之方案

面对极权主义不再消极，而是采取积极的攻势。在所有领域展开对极权主义政权的解构，和平地、全面地，见缝插针，随时随地，随机地抵制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各尽所能，实施解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可以大略粗分为两个层次：1.解构极权主义话语，包括极权主义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文化等等；2.解构极权主义制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解构方案的来源：1.来自民间，自发的；2.来自政治反对派，刻意设计的；3.或者两者交融的。

中国民间一直就存在自发的解构行为。民间对此多有创造，比如不婚不育，直接反抗中共的生育政策；比如在家拒绝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拒绝进电影院看战狼电影，以此反抗虚假新闻和虚构的历史；比如十·一长假，不出门，出了门也不花钱，使其刺激消费成空谈；比如自发地躺平，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让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海市蜃楼。在民间自发的解构行为中，最有启发也最有效的是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我们把彭立舟在四通桥上挂出的横幅，把白纸运动中的白纸，都可视作是话语反抗的形式，它已显示出凝聚民心的作用。

在极权社会里，民间社会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民间社会对极权社会的反抗首先从争取话语权开始。为了争取民间社会的话语空间，必须在所有领域对极权话语进行积极反抗。

底层社会使用反讽话语。一个使用反讽和流氓话语的底层社会正悄悄地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地带迫近中心地带。一场对极权话语的反叛和挑战，在文学、艺术、音乐、影视和网络等领域悄然推出。反讽话语和流氓话语的使用，不一定就具有道德的贬义，恰恰相反，它是对极权道德的对抗，是对极权话语的突破。

从王朔的流氓话语叙述“我是流氓，我怕谁”，王小波的荒诞叙事《黄金时代》，到贾平凹喷薄而出的情欲《废都》；从崔健坦荡的摇滚叙述“一无所有”，到何勇的摇滚直白“我们生活的世界，就象一个垃圾场”；从张艺谋的流氓电影叙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张后期堕落为帝国美学的鼓吹者），到胡戈的反讽影视语汇《大话西游》；从方力钧的北京大院泼皮组画，到丘敏君的社会傻人脸谱系列；从刀郎的《罗刹海市》，到躺平歌《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句句如刀直扎人心；从网络愤青的流氓秽语和色语叙事，到手机里的黄段子、黑段子和灰段子，都不胫而走，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笔下的街痞社会、市井社会、犬儒社会和躺平社会是对官方粉饰的有序社会、官本社会、和谐社会和伪道德社会的反讽和反叛。他们以反讽话语和情色张扬的叙事方式，从国家主义正论话语叙事的领地夺得一份空间。

山寨话语叙事是反讽话语叙事的延续和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反讽文化是从正统剥离，那么山寨文化则是对正版颠覆，其手法是偷梁换柱：保留外壳，篡改核心。以民间艺人的嘻笑怒骂取代御用文人的歌功颂德。山寨版国骂“草泥马河蟹”与“法克鱿河蟹”正是网民对当局封锁网络言论自由的强烈反弹，把反讽话语对“和谐”社会的反抗发展到极至，而成为名噪一时的经典。山寨话语不仅仅具有草根文化的一些特征，关注民间疾苦、触摸社会底层的诉求，

而且隐含对权利和尊严的追求，其潜台词常隐含政治色彩。

这是一场极权社会晚期反讽话语叙事的民间抗争形态，虽然它仅仅是一种弱者策略，但却是离经叛道的姿态，以反讽、戏谑、恶搞等喜剧语汇排斥和挤压极权话语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具有对极权话语进行解构和破坏的作用。在与体制的博弈中，底层社会能够敏捷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话语，并且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语汇，比如一句简单的“你为什么哭泣？”，在社会底层立即就有积极的呼应和共鸣，因而也就对极权具有了一定的杀伤力。它是弱者的反抗，来自底层，自发，带着嬉笑怒骂，带着哭泣，带着揪心的痛。

维权社会使用悲剧话语。在与体制的博弈中，中国的维权群体迟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没有掌握应有的维权话语。弱势群体通常把角色定位在体制尚能容忍的边缘游走，而维权群体虽然也是弱势群体，但由于中国维权运动的终端立场是反体制的，因而维权群体往往在萌芽中就被镇压；遗憾的是，本应拿出强者姿态的他们至今还站在弱者的地位上，处于零散的、自发的、游离的状态；他们被侵犯、被剥夺、被侮辱的地位使其话语多具悲伤、悲情、悲愤和悲剧色彩，尚不具备公民社会的话语品质，当然也就无法摆脱被一再打压和边缘化的命运。

遗憾的是，中国的维权群体至今还处在自发和相对盲目的阶段，多数案例所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利益。处在维权浅意识状态的维权群体缺乏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对什么是社会深层的原因，什么是制度深层的原因，哪些能从法律层面解决，哪些则要从制度上解决，还不甚清楚；对人的独立尊严和公民权利，还倍感陌生，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中国的维权群体在提升维权的层次时难免困惑。

因此，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一个悖论：即维权语汇的缺失。维权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必定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辩护来为被侵权者讨回公道，因而他们不得不借用现有的司法语汇；但是现实的司法本

身就是极权的寄生体或派生物，它能给予维权胜诉的空间极小。如果背离侵权具体案件，维权则被抽象化，司法从中淡出，政治从中突显，被侵权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在空泛的政治口号中被忽略，从而无以凝聚社会资源。

维权是一场公民运动。维权力量的聚集是公民力量的聚集，维权的最终指向是公民社会的建立。维权语汇必定从两个语境中同时走来：维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在追求司法公正时突显公民权利，在提升公民意识中提升维权品质，并从这个意义上衍生出公民政治和公民不合作运动。只有当维权进入公民社会的现代语境时，维权才能摆脱上述悖论的困扰。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及其发展与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的成熟过程同步，更与公民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大量的维权诉讼中正义得不到声张的事实，促使维权话语向公民话语提升，街头抗争向司法博弈过渡。维权的组织规模只能是被侵权者在寻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利益一致的群落横向整合的结果。但是维权的组织效应决不是被侵权者个体的简单迭加，它是在公民力量的基础上维权群体的集合与社会资源的凝聚。维权不具有政治诉求，不具备政治斗争的品质，这是维权应有的定位，也是维权斗争应有的话语定位。同体制话语剥离，对国家话语进行颠覆与反抗，坚守公民权利，被实践证明是维权有效的抗争形式。

当中国人的权利都被剥夺时，维权就不再是个案。当整个社会充斥着邪恶与病态，比如拖欠工资者不坐牢，讨薪者要坐牢；强拆他人房屋者不坐牢，捍卫家园者要坐牢；贪污腐败者不坐牢，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要坐牢；制造冤假错案者不坐牢，维权律师要坐牢；碰瓷诈骗者不坐牢，搀扶跌倒老人要坐牢；……。当整个社会正邪颠倒，社会正义和公正得不到伸张时，维权运动便会从个体向群体凝聚，向着公民社会运动行进。维权的语汇也会随之提升。

解构现有的极权司法语汇，撕开当前司法与宪法的虚伪，以赢得民心，这需要维权人士和法律精英们共同努力，以普世价值的语

汇构建法治文明。

精英社会使用正剧话语。文革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开始重新聚集，这是西单民主墙和八九民运被极权镇压之后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两场运动将 1949 年后中断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薪火重新点燃。从那时候起，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又重新挺直了脊梁，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话语反抗和政治博弈，孜孜不倦地传播普世价值。逃亡之路，铁窗生涯，丝毫不减锐气。不少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其话语也在发生改变，对极权话语偷梁换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人们看到普世价值在他们的话语中也在频频出现。极权话语的疲软已出现无可挽回的颓势。

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体制外聚集，他们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博弈色彩，但由于极权体制对舆论的控制而将其与社会底层隔离，其语汇虽然如阳春白雪，但由于缺乏社会大众的理解却难免不被束之高阁。因而一场突破话语封锁，扫除话语障碍的攻坚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时《零八宪章》出现了。

《零八宪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和整合提供了一个凝聚点；《零八宪章》为维权实践和政治博弈两军汇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结合面，促成政治精英与公民力量的结盟；《零八宪章》是对民间社会话语抗争的一个归纳和总结，集其大成者；《零八宪章》向维权群体提供话语和思想储备，进而提供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的现代语境。《零八宪章》在提升公民品质和政治智慧中，著重公民社会的构建，这符合中国民主运动的百年大计。

《零八宪章》不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把它的语汇，逐步镶嵌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中去，镶嵌到普通百姓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将话语反抗从底层社会和维权社会提升到全社会，这才是解构极权主义的正路。不一定需要高举什么旗帜，但一定要灵活运用它的语汇。话语反抗要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一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只要老百姓拿来使用，那就是不可忽略的抗争：

比如，当权力黑化时，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请问你手中的权力来源合法吗？”；

比如，推动县市普选，“还我选举权”“参政议政是公民权利”“请领导定期向人民述职”；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人的情感和服饰罪名化，可以提出“我的情感我做主”“请公权远离私人空间”；

比如，当警察和军人镇压民众时，可以打出旗号：“文明警察，文明执法”“解放军不是私家军”；

比如，当面对贪官污吏时，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公权不是用来谋私利的”；

比如，当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可以质问“我们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享受财富的人，不是创造财富的人；创造财富的人，却被剥夺了享受财富的权利”；

比如，当政府停发社保，可以质问“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无所依！”“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决定政府的性质”。

比如，当老百姓得了重病，可以要求进住高干病房；遇到天灾，可以要求特供，为什么不？

比如，当有人宣传三个代表时，可以发问，“包二奶，这是代表谁啊？”“去许家印的第42层红楼，这又是代表谁啊？”

比如，当有人宣传四个自信，可以发问“巴铁都不铁了，还跟谁铁啊？”“外资都撤了，都是因为外资太自信啦”，等等，等等。

虽然，话语反抗是初级阶段的行动，但是，只要坚持长期且韧性的抗争，就会见效。

解构极权主义的行动提升

解构极权主义的行动，在必要时，需从话语反抗逐步向解构极权制度提升。话语反抗可以依靠民间的创造力，但如何解构极权主

义制度则需要一批有思想、有经验、有实干能力的精英来制定方案，那是文章开始时所说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的使命，是《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的使命。我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有限，真正好的方案，看大家的。我个人只起个引子。

二、如何解构极权主义？

1.解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

全美学自联向美国贡献了一个处理中美关系的高级智囊——余茂春先生。由于他的努力，得以教育美国政府高层如何深刻认识极权中国的本质；在他的说服下，美国政府得以纠正过去对极权中国的错误判断，并得以制定相对合理的对策。这就是近期解构极权中国外交的一大重要成果。以外交逼迫政治，这对中国政治必然会产生连锁影响。人才是解构的前提，因此要广纳天下精英参与解构方案的制订。

我个人建议，通过推动县、市一级县长和市长选举，争取老百姓在行政基层的选举权，是解构极权中国政治的可行的突破口。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2.如何解构极权主义经济制度

全美学自联向我们贡献了经济学家陆文禾和许小年，他们对解构极权主义经济有着卓越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学人才。相信可以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学人才，令其在解构极权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

我个人建议，首先要打击权贵资本。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为突破口。官员贪污腐败是在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制的掩护下进行的。官员公示财产，可以防止腐败，从而为市场经济开辟健康的经济环境。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3.解构极权主义社会制度

极权主义社会是封闭的，病态的，死寂的，因为人被奴化，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基本的公民意识。要解构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需要每个人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人格。

找回尊严，就要对极权主义说“不”！既可消极地说“不”！即保持沉默，保持蔑视，不合作，不听命；也可积极地说“不”！可以据理力争：“凭什么啊？”“为什么啊？”，驳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荒谬，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与兽道主义进行思想搏斗。以公民的姿态揭露谄媚的卑劣，告密的丑陋；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上，解构极权主义的社会行为。

不论前路如何艰险，都要像许志永、丁家喜那样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公民运动，展示公民觉醒、公民素质，落实公民自治、公民权利，争取社会正义。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4.如何解构极权主义文化制度

解构极权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解构极权主义审美。帮助民众认清所谓的“高，大，上”，皆为低俗，丑陋，猥琐。应该鼓励音乐家、美术家、雕塑家和文学家们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创作优秀的作品，并对极权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

比如，创作更多的像《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这样易于吟诵的通俗歌曲，或作词，或作曲，让人们口口相传。

比如，对于陈凯歌的爱国大片《志愿军》，一部极权颂歌，号召民众拒绝进电影院看它，令其票房冷落。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实质是公民抗争；分两个层次，一是解构极

权主义话语，包括解构极权主义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和审美，话语抗争是初级反抗形式，容易推广和铺开，且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解构极权体制，包含解构极权的政体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深入的解构形式，需要探索如何拆卸、如何肢解，这是一份艰苦卓绝的工作。

不依赖暴力，不依赖金钱，只期待众人群策群力，亲历亲为。

不寄托于极权中国有一日会轰然倒塌，不寄托于一次两次街头运动能迫使极权政体让步，寄望于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公民抗争。

解构本身不是目的，解构的目的是建构民主制度，建构公民社会。

2023/10/18